

为失散家庭的团圆欣喜,更要看到背后的沉重与艰辛

本报评论员 韩轲超

杨某弟。12月6日,3组家庭得以认亲、团圆,其中有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和其失散多年的儿子孙某,孙海洋夫妻与儿子孙某相拥而泣。

2014年,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上映,片中孩子被拐后父母的痛苦与多年寻子的艰辛,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现实中,影片原型孙海洋在2007年孩子被拐后,便踏上了漫漫寻子路。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今年7月,另一部打拐题材电影《失孤》原型成功认亲。

近年来,一系列被拐案件经媒体报道,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案件的走向和进展牵动着亿万网友的心,在引发公众共情、共鸣的同时,激起人们对拐卖儿童行为的深恶痛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和建制。

拐卖儿童行为,不仅会对被拐孩子的一生造成挥之不去的伤害,更会毁掉一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亲生骨肉一朝失散,多年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对被害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寻子过程所付出的人力、财力、精力难以估量,同时,其对社会伦理、法律正义、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冲击。必须对拐卖儿童“零容忍”,这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新闻中,失散家庭的团圆来之不易,这得益于技术手段的进步,DNA比对、人脸识别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寻找被拐儿童的过程中;这得益于公安、民政等部门对案件的精准分析和研判,以及对大量陈年旧案的“不离不弃”;这还得益于媒体和民间公益力量的积极推动,以及诸多爱心人士的点滴努力。从公安部上线的“团圆”系统,到各类寻子网站和平台,以及一些互联网企业发起公益寻人项目、拓展失踪人员信息紧急发布渠道等,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到打击防范拐卖行动中,正在合力织就一张寻子、打拐的大网。

必须正视,即使是对寻子成功的家庭来说,这份团圆也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沉重。有网友说,“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家庭,会失去两次孩子,一次是被拐走时,一次是被找到时”。因为亲生父母在欣喜过后,往往还要面对孩子不认识、不熟悉父母的尴尬,孩子不愿选择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的失落,以及岁月已逝、再也无法陪伴孩子一同成长的巨大遗憾,甚至是否在追究养父母法律责任上做出艰难的权衡。正如有报道提及寻子群里的聊天内容时说,“群里从来没有人会提到找到

孩子以后的事,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从一种难进入另一种难”。

因此,我们在为失散家庭的团圆而欣喜的同时,更要看到背后的沉重与艰辛,更要看到在这些被镜头聚焦的寻子成功案例之外,仍有不少孩子未能被找到,仍有若干家庭苦苦奔走在寻子的路上。这一不幸的群体需要被看见、被抚慰、被帮助。

为了早日清除拐卖人口这一社会毒瘤,有人呼吁加大对拐卖人口行为的惩治,提高拐卖人口的起刑点;有人建议国家直接提起公诉,强制解除买方的收养关系;还有人建议取消目前拐卖儿童犯罪诉讼时效20年的时间限定,提倡媒体多报道选择认亲后与亲生父母一同生活的案例……“让天下无拐”,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数月前,国务院制定《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明确表示要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无疑,这事关无数家庭的平安与幸福,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更艰苦的努力。

社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即使是对寻子成功的家庭来说,这份团圆也往往伴随着诸多的沉重。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这些被镜头聚焦的寻子成功案例之外,仍有不少孩子未能被找到,仍有若干家庭苦苦奔走在寻子的路上。“让天下无拐”,事关无数家庭的平安与幸福,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更艰苦的努力。

据媒体报道,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广东、山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3起部督拐卖儿童案件,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找回被拐14年的孙某、符某涛和被拐17年的

理性看待表情包成“呈堂证供”

冯海宁

据12月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注意到,表情符号已经登上多地法院判决书,不仅有民事案件还有刑事案件,它们成为相关案件在判罚或定性时的一个辅助证据。有专家表示,鉴于表情符号含义的模糊性,如何解读、认定网络表情的含义,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司法者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社交媒体快速发展,沟通聊天、转账交易等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因而,电子证据成为“呈堂证供”也是一种趋势。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明确支持多种网上信息作为电子证据。比如2015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明确了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信息可以视为民事案件证据。

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电子证据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修改后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电子数据的范围,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以及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均可作为证据使用。

作为参与网上交流的要素之一,网络表情符号本身就可能承载着很多含义,其在某种情况下作为证据或辅助证据,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浙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刑事案件的判决中写道:“刘某等人在卖淫活动后多次向祝某某的微信号发送微笑等表情符号用于报账。”

不过,由于一些表情符号的含义比较模糊,容易导致不同理解。因此,在表情符号“证据化”的趋势下,司法机关应保持足够审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相关证据、前后语境作出是否采信的判断。要避免这类证据产生歧义,进而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应该明确,表情符号丰富多彩,凝结着创作者的智慧和幽默,不同使用者对其理解和认知也不同。作为一种“新证据”,它反映出的是时代的变迁,也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更高追求。对其作为证据的证明力,仍有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探索。对此,公众和司法机关都应理性看待。



图说

难题

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河南郑州公安交警部门将接送学生车辆、人员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学校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班级、三好学生考核评价范围,引发网友广泛讨论。部分网友认为此举属于“连坐”,也有网友认为,学校门口的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用管孩子来管家长,不失为一种办法。

用孩子约束家长,这种惩治方式或许能为有关部门省去一些治理成本,但对校门口的交通秩序进行治理,真到了非这么做不可的程度吗?毕竟,交管部门可以采取的手段很多,劝导、罚款、加装监控设备,等等,哪怕是让违规的家长负责维持校门口的秩序呢。话说回来,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在遵守交通法规的问题上本不该让交管部门如此操心。更何况,一些校门口放学时的混乱场面已然造成了对公共秩序的干扰。这是一个需要交管部门、学校、家长共同应对、相互配合的问题。

赵春青/图 轲超/文

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也是在化解“急难愁盼”

李英锋

据12月7日《法治日报》报道,2017年5月,河南周口的老朱在工地触电受伤,法律援助律师依法为其讨回医疗等费用共计33万余元。像老朱这样的低收入者,成为周口市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后的最大受益者。时下,不少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都逐步扩大援助范围,进一步简化程序。有的地方还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等法律援助事项,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同时“一援到底”,避免受援者多次奔波。

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是诸多司法行政机关的共识。这当中,废除法律援助案件申请经济困难状况“证明制”,改经济困难证明为经济情况说明,是重要举措之一。

自有法律援助制度以来,经济困难证明

往往是申请法律援助的前置条件。而开经济困难证明并非易事,申请人往往要跑不少单位,有时还可能“一事跑全城”甚至跨城开证明。因为无法提供“适格”的经济困难证明或经济困难情况不符合条件,不少申请人无法得到法律援助。这也成了申请人权益维护或权益实现的难点、堵点、痛点之一。

有鉴于此,今年8月20日修订后将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援助法》进一步降低了法律援助的门槛,对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作出了调整。根据该法,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查询,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等四类法律援助申请人,确立了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规则。

如今,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主动作为,有些改革举措甚至做到了法律正式落地之前,把

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让一些民众可以提前享受到法律的利好,这值得点赞。

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减轻申请人的负担,提升申请法律援助的便利性,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改革、作为。目前,已有多省将涉及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还有的地方通过使用福利彩票专项公益资金,让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之光照射更多的人、更多的事。

申请法律援助的人大都属于弱势群体,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大都属于急难愁盼事。法律援助降门槛也是在化解民众的“急难愁盼”。这对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具有积极意义。

某种角度上说,法律援助的门槛也是民众权益实现的门槛、民生保障的门槛,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无论对公众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实事。

由第三方公司人员去开展一些工作,不是不可以,但显然要对相关服务的具体内容有明确的限制和约定,甚至要有一份具体的清单,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行为不能有。否则,一些人很有可能“拿着鸡毛当令箭”,做出出格、违规的事情。

前几年,对类似简单粗暴的执法,相关地方和部门都称是“临时工”“协管人员”所为。这背后同样是对执法权的认知和行使出现了偏差,也有推诿搪塞、懒政怠政之嫌。试想,如果执法权都能外包,那执法者乃至更多公务员的准入门槛还有什么意义?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穿上制服,到群众面前去吆五喝六,那整个执法队伍乃至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何在?

透过此番个案更应反思的是,相关地方和部门必须严格控制外包服务的内容和数量,严格约束协管人员的行为和权限,不仅是要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更要避免行政权被下放、被滥用,进而危害群众。

城市管理上不能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只有以人为本,依法行使职权,懂得吸取教训,才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真正造福一方百姓。

融媒作品选粹

跨越26年的对话



1994年,张从顺为保护战友牺牲在缉毒一线;2020年,张从顺的儿子、缉毒警察张子权因过度劳累牺牲在办案一线……近日,禁毒牺牲的父子共同获年度法治人物。一家戍边人,父子两忠烈。张从顺、张子权这对英雄父子的忠诚赞歌在云岭大地久久传唱。(本报记者 黄榆 赵黎浩)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泪目!这段英雄禁毒父子的对话,跨越了26年……》



博物馆里的法治脉动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12月4日是第8个国家宪法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法院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法律古籍珍本,同时存有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珍贵展品和影像资料。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座百年建筑,感受法治的脉动。(本报记者 卢越 雷宇翔)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探馆vlog|国家宪法日,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感受法治脉动》



当头灯点亮地铁隧道



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离不开各个工种的密切配合,城轨接触网检修工就是其中之一。潘二保是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的城轨接触网检修工,每天凌晨,当人们进入梦乡时,他和工友们进入隧道,借助头灯照亮工作面,开始了检修工作。(本报记者 王伟伟 白至洁)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北京地铁的“夜行者”|三工视频·新360行之城轨接触网检修工》



直击中老铁路首发现场



12月3日,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首发车共有700多名旅客。乘坐列车,可看湖光山色,赏热带雨林。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将为加快建成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本报记者 黄榆)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直击中老铁路首发现场》



文字整理:赵琛

服务可以购买,权力不能外包

史洪举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12月6日,一段“城管抢走老农甘蔗”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并引发热议。随后,该视频得到证实,事发江苏南通海门三星镇,官方称身穿制服的人并非城管,而是政府购买市容管理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人员。7日,海门区政府发布说明,区纪委介入调查并启动问责程序,三星镇政府登门向老人致歉,终止与涉事第三方公司合作,并召开全区城管执法人员警示教育会议。12月8日,当地通报处理情况,一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四人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镇长被给予诫勉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报道显示,事发后,涉事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地农贸市场为农户保留了自产自销区且不收摊位费,但卖甘蔗老人经常沿街售卖,

市容管理人员多次劝阻无效才暂扣。三星镇政府也证实,老人确实多次不听劝阻。

此番事件中,人们追问和关注的焦点是涉事第三方公司到底有没有权力、资格去进行相应的管理。从涉事公司的工商登记看,其业务主要是清理小广告、清理乱涂乱画乱扔杂物、维护市容整洁等。这当中,维护市容整洁的概念可能比较宽泛,也容易给相关人员造成一种权力错觉,以为只要是维护市容所需,便可以为所欲为。

现实中,一些基层政府由于事多人少,便采用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但应该明确的是,购买服务可以,执法权不能外包。

正是为了避免执法权被滥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执法主体进行了严格限制——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应当由城管执法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不得委托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不得安排临时工作人员从事执法工

作;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对于城市协管人员的权限,相关法规和规章也有明确。比如“协管人员只能配合执法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巡查、信息收集、违法行为劝阻等辅助性事务,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协管人员从事执法辅助事务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本级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承担。”

此外,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的组织必须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等等。

执法是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既关乎当事人切身利益,也关乎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与形象。执法要有法律的授权,要由有执法权的人去开展。一些地方以购买服务的方式,